

陶行知：从爱国心到“爱的教育”

□吴梓明

引言

今年恰逢陶行知（1891—1946）逝世80周年，也迎来我国第42个教师节，让我们一起纪念这位“近代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”，也更好地“学陶”“师陶”和“研陶”。

陶行知是五四运动以来极具影响力的人民教育家，他最为教师们熟知的两句名言是“千教万教，教人求真；千学万学，学做真人”和“捧着一颗心来，不带半根草去”，他勉励教师们要以赤诚和仁爱之心投身教育事业，亦创建了一套“爱的教育”理论，体现了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国情和时代的特色。事实上，在重温陶行知的生平故事时，我们更可以发现陶行知具有强烈的爱国心，这促使他真正成为一位“近代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”。



上海大华行知公园的陶行知铜像 图/视觉中国

陶行知的生平故事

陶行知自小接受传统私塾教育，15岁进入崇一学堂。1909年，18岁的陶行知考入南京汇文书院。1910年，汇文书院与宏育书院合并成立金陵大学堂，他随之升入该校文学系，1914年毕业。

在崇一学堂读书时，陶行知曾与其他同学谈论出国读书的意图，许多同学计划出国后就不再回国，陶行知没有跟同学们争论，只在学生宿舍墙壁上写下：“我是一个中国人，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。”这句话表明，他早已立下学成归国、服务国家的志向。

其实，早在17岁时，陶行知曾一度像孙中山、鲁迅和郭沫若等一样，萌生行医济世、习医救国的念头，并以优异成绩考进杭州广济医学堂。但进入广济医学堂的第三天，他便决定离开，因为他发现学校规定学生必须入教洗礼才可实习医科——陶行知觉得，这是对非基督徒的歧视，与他所了解的基督教不符。再过一年他便考入上述南京汇文书院读书。

在金陵求学的五年里，陶行知增长了知识、锻炼了才干，其政治思想和人生价值观也得以深化。求学期间，陶行知经历了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变革。当时，许多年青学子怀抱“读书为救国”的志向。陶行知也逐渐形成了民主共和、自由、平等和博爱的信念，他在大学毕业论文《共和精义》中，曾指出“共和”精义的根本就在“自由、平等和博爱”三大信条。其中，“博爱”（即“民胞”）是“共和”之大本，这是陶行知“共和”思想的一大特色：必须兼具“博爱”精神。

大学毕业后，陶行知拿到一笔奖学金，计划前往美国伊利诺大学（今译作伊利诺伊大学）修读政治学，准备学成回国服务。此前，他曾尝试从医救国；后来选择修读政治学，也出于同样的报国志向。1915年夏天，他决定转向教育，认为教育才能更有效地改变国家的未来。那年秋天，他毅然离开美国伊利诺大学，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

读教育学博士学位，师从美国著名哲学家、教育家杜威（John Dewey）和教育史学家孟禄（Paul Monroe）。他也是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。从学医到修读政治学，再到研究教育，他始终怀抱着一颗爱国心。

“教育救国”的实践

1917年，陶行知收到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郭秉文的邀请，回国在该校任教育学专任教员兼教务助理，后任教育专修科主任、教务主任。1921年，陶行知参与筹组中华教育改进社，后任该社主任干事、总干事，致力于推动教育改革。1923年，陶行知更与晏阳初、朱其慧等共同发起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，继续推行平民教育。此后，他又先后开展乡村教育、普及教育和生活教育等实践，发起“小先生运动”、倡导民主教育和创造教育。

民国初期，不少知识分子特别尊崇西方的科学与文化。陶行知在美国读书时，是杜威的学生，也学会了什么是“进步的教育”“教育即生活”“教育即成长”等先进的现代教育理念；但他不认同“全盘西化”，也并不同意将整套西方的教育哲学照搬来中国。

立足中国实际，陶行知对杜威的教育思想作了创造性转化。杜威主张“教育即生活”，陶行知则提出“生活即教育”，提倡在生活里教育、用生活来教育、为生活而教育。换句话说，即在生活中接受教育，在各种生活环境中进行教育。这样的教育贯穿人生始终，因而也是一种终身教育。

另一方面，当杜威主张“学校即社会”的时候，陶行知却主张“社会即学校”。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呢？陶行知曾以鸟笼作比喻：当我们说“学校即社会”时，就像是将一只活泼可爱的小鸟从天空中捉下来、放在鸟笼里；然后将它生活所需的一切放进笼里，要它学习在笼子里生活。笼子里的生活并不能完全等同外边世界的生活，它甚或可以是

“弄假”和“不真实”的。“学校即社会”就是这样。但若是说“社会即学校”，情况就完全不同了。“社会即学校”是要让孩子回到自己的生活环境中接受教育，这样才是孩童真正需要的教育。

换言之，陶行知并非照搬杜威的教育理论，而是立足中国社会实际，对其作出创造性转化。“生活即教育”“社会即学校”等主张，体现了他探索教育思想中国化、寻求适合中国国情教育道路的努力。另一方面，陶行知仍然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，他曾醉心于王阳明“知行合一”学说，亦两度将自己的名字改写，本来是“陶文浚”，1911年改名为“陶知行”，表明他并没有否定中国传统文化，且坚守王阳明“知行合一”的学说。不过，他后来（1934年）又改名为“陶行知”，表明他是希望更进一步“完善”王阳明的“王学”。

阳明心学（亦称“王学”）主张“知行合一”，受其影响，陶行知起初在教育领域主张“教学合一”，后来进一步提出“教学做合一”（即“教、学、做”是一件事，三者是结合为一体的）。他认为，生活和教学都应从“做”开始，活一天，便“做”一天；“做”是行动、是思想、是新价值之产生；“做”是发明、是创造、是实验、是建设、是生产，是探寻出路。

为什么要将“陶知行”再改名为“陶行知”呢？因为他发现“教、学、做”三者中，“做”最为重要，他说：“事怎样‘做’便怎样学，怎样学便怎样教”。比如种田是要在田里做的，所以必须在田里学、在田里教。1934年正式改名以前，他已不再停留于自己早年从阳明心学中接受的“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”，而转为主张“行是知之始，知是行之成”。

换言之，陶行知尝试从新的视角重新理解知与行的关系，超越自己早年对阳明心学的理解，为中国教育寻找一条新的出路。他的教育主张立足中国社会和民众的实际生活，强调从实际生活处境中思考教育的问题，这也是来自他的“爱国心”“教育救国”和“教育处境化、中国化”的新思维（包括他的中国版的“爱的教育”）。

“爱的教育”在中国

陶行知在推动“平民教育”和“生活教育”的同时，也强调“爱的教育”。1927年，他在南京晓庄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，简称“晓庄师范”或“晓庄学校”，为中国教育探索新的道路。

晓庄学校的一个重要教育理念是“爱的教育”。陶行知在《晓庄三岁敬告同志书》中说：“晓庄是从爱里生出来的。没有爱便没有晓庄。”在他看来，晓庄爱人类，所以他爱人类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中华民族；因为他爱中华民族，所以他爱中华民族中最不幸的农民。这种爱从农民出发，从最多数最不幸的人出发，他的目光，没有一刻不注意到中华民族和人类的全體。

“晓庄是从这样的爱心里出来的……爱之所在即晓庄之所在。”晓庄的教育理念，集中体现在“捧着一颗心来，不带半根草去”这句话中。

从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的角度来看，“爱的教育”就是一种新的文化思维。事实上，陶行知在中国所主张的生活教育、乡村教育、平民教育，都是从“爱的教育”延伸出来的，也是一种大同世界的教育思维，因为他的教育理想就是“爱满天下”。

就中国传统教育而言，陶行知“爱的教育”的主张，是一种新的道德教育探索，可以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。他所主张的“爱的教育”和“爱满天下”的教育理念，已经是中國版的“爱的教育”，是他特别为中国人民而设计的，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，体现了他“教育救国”和探索教育中国化的努力。

“爱满天下”是他的教育理想，而以教育服务中国人民，正是他爱国心的具体体现。

（作者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、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研究员、上海大学文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客座教授、广州市新时代民族宗教领域研究智库专家成员，现任广东省江门市中加柏仁学校学术顾问）

漂洋诗笔载乡愁：近代华侨报刊中的文化认同书写

□童雯霞

近代中国社会剧烈动荡，东南沿海民众为避战乱、谋生计，大规模远赴南洋、美洲等地定居谋生。在跨洋迁徙与异域寄居的时空处境下，海外华侨将羁旅之苦、乡土之思与家国情怀诉诸旧体诗词创作。近代华侨报刊，不仅是侨民获取资讯、联络社群的传播载体，更成为普通华侨开展文学书写、建构文化身份的公共文化场域。刊载于侨报副刊的诗词作品，突破传统古典诗词精英化、书斋化的创作传统，扎根底层侨民的真实生活体验，承载着离散族群的情感结构与文化心态。从乡土眷恋的个体抒情，到社群联结的文化自觉，再到救亡图存的国家认同，侨报诗词呈现了近代海外华人文化认同的递进过程，推动中华文脉在异域侨社落地延续、代代传承。

报章载诗：印刷媒介与华侨精神共同体的建构

晚清以降，东南沿海民众掀起大规模跨国迁徙浪潮。据《东南亚华侨华人经济简史》统计，至20世纪30年代初，全球华侨华人总数已达1220万。又据《潮汕华侨史》，1840—1949年间，约有400万潮汕人过海谋生。散居海外的侨民，通过聚居、结社形成相对稳固的侨社社群，在生存层面实现了抱团相依，但并未摆脱跨文化离散所带来的精神无根性。身处中西文明交汇的异质空间，华侨不得不面对语言、风俗、制度与族群文化的多重差异，长期处于文化边缘与身份悬浮的状态，而华侨报刊所载的诗词在一定程度上抒写、抚慰了游子的精神疏离与文化焦虑。

这种离散焦虑常被诉诸侨报中。《香山旬报》所载晓峰《又秋思忆怀》有句：“梦逐天涯悲断梗，身飘瀚海寄浮萍。梧桐叶落萧萧下，最怕思君不忍听。”诗人以断梗、浮萍为喻，道出海外游子漂泊无依、无所归止的生命境遇，是一代侨民集体心态的诗意缩影。面对普遍的精神空虚与文化失序，海外侨民需要一方稳定的公共媒介与文化阵地，用以凝聚乡谊、整合情感、延续文脉，缓解离散族群的身份危机与精神困境。

在此时代语境下，南洋《叻报》《星洲日报》、广州《美洲同盟会月刊》等华文报刊相继创办，成为联通故土与侨居地、整合海外华侨华人社群的重要媒介。早期华侨报刊以时政新闻、商贸信息为主，工具性、实用性特征突出。随着文化需求的不断增长，报刊增设“诗林”“嘉言”“文苑”“艺苑”“杂俎”“美人香草”诗词专栏，实现传播功能从“信息传递”向“文化建

构”的延伸。本尼迪克特·安德森在《想象的共同体》中提出“印刷语言建构想象共同体”的观点，认为印刷媒介通过统一的文字体系与公共传播场景，打破地域、阶层与身份隔阂，为分散个体提供共享的文化符号与情感基底，成为共同体意识生成的重要前提。

侨报诗词专栏消解了传统旧体诗词的精英圈层壁垒，使古典文体从文人雅集和书斋酬唱下沉为普通侨民的抒情文本。侨商侨领、文教人士、初中学子等不同阶层的海外华侨华人，皆可借诗词书写人生境遇、抒发内心情志。这些诗词直面异域劳作的艰辛、漂泊生活的困顿与离散生存的悲欣，摒弃空洞抒情与刻意雕琢，以真切生命体验激活古典文体的当代生命力，呈现出区别于传统诗学的民间气质与时代质感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报刊印刷所塑造的“同时性”阅读场景，使散落四海、彼此陌生的侨民在同一时段共享文本、共情情感，形成跨空间的集体文化体验。从华侨报刊诗词题目中的“步韵”“和韵”“奉和”等字样可见，华侨群体通过“投稿—刊发—唱和”的文学往来，凝聚起华侨群体跨越时空的文化认同。这种公共传播机制将个体化、碎片化的漂泊心绪与乡土思念，汇聚为群体性、整体性的文化共鸣，完成了私人情感向公共文化心态的转化。华侨报刊由此构筑起海外华侨华人的精神栖居地，为侨诗创作传播、侨社文化凝聚与海外中华文化认同建构，提供了坚实的媒介支撑与社群基础。

平仄寄愁：乡土记忆与离散身份的文化确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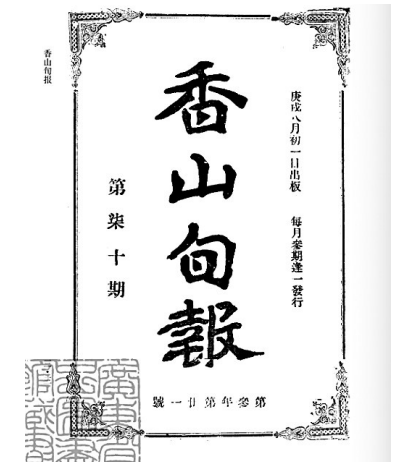
乡愁是近代侨报诗词最为稳定的情感底色，也是海外离散族群维系本土文化记忆、完成自我身份确认的核心精神机制。在近代交通闭塞、音书难通、归乡无望的历史条件下，异域生存时的时空疏离感不断唤醒侨民的故土记忆。旧体诗词凭借普罗大众所熟悉的意象体系与抒情范式，成为华侨承载羁旅孤寂、留存乡土经验、锚定文化根脉的文学载体。万源在新加坡的1946年创刊号《南洋半年刊》上有一阙《满江红（思乡）》，词云：“漂泊萍踪，虚度了良辰佳节，他邦远托生涯，至今犹拙。黄叶催人颺梦短，白云撩客乡思切，最销魂关路锁寒烟，伤离别！弹珠泪，愁肠结，游子恨，何时灭？看星洲隄畔，几番明月，异地风光虽逸趣，故园景色尤清绝，问那年方得赋归休，心欢悦！”词人以浮萍为喻，写出漂泊不定的生活状态，为

谋生远赴他乡，却未能成功，暗合对自身处境的无奈。“黄叶”暗示时光催促，羁旅之梦短暂；白云悠悠更触动客居他乡的愁绪，使乡思愈发浓厚。异地风光虽有逸趣，但比不上故乡的景色，恬淡的异乡之景反衬游子飘零之苦，细腻呈现侨民身在异域、心系故土的恒定状态。

“明月”作为中华诗学的经典意象，在侨报诗词中被赋予更强的跨时空联结意义，成为离散侨民沟通故土、安放乡愁的精神符号。山海隔，唯有皓月一轮共照中外，联通南北，成为跨越地域壁垒的精神媒介。《潭冈乡杂志》第18卷第5期潜叔《八月旬夕病后登楼望月》，有句云：“久病乍惊秋气肃，新痊怕见月光潋。闲云有岫归南浦，孤雁无栖驻碧峰。”秋肃、月溶、闲云、孤雁，作者用这些最常出现于传统诗词的意象构建了清冷孤寂的抒情意境，借云归山，反衬自身飘零无依、归期渺茫的身世处境，将病痛之苦、漂泊之叹、乡土之思融为一体，情感沉郁真挚，极具群体共情力。

家书意象进一步拓展了侨报乡愁书写的情感深度，突破传统思乡文学的温情范式，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心理结构。有时，家书是慰藉羁旅心灵的温暖符号，如刊载于1910年《香山旬报》、署名慨公的《寄内》有句云：“壮志名途远，孤栖客路难。殷勤聊报汝，两字写平安。”要奔一个前程，作者离家远行，在外漂泊的孤独和艰难一言难尽，他能做的就是给妻子传回家书，常报平安。有时，家书的意象也表达了作者愧疚、自责与焦灼交织的复杂情绪。墨西哥的《正言月报》1928年第5号第58期有许穰《自感》：“离乡别井寄人篱，多少衷情只自知。旧恨新愁风吹起，家书殒我蹈良规。”家书带来的亲人期许与自身漂泊潦倒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，使乡愁叠加身世之叹，情感层次更为细腻真实，更贴合侨民的生存现实与心理状态。送别是侨刊诗词中最常见的主题。陶融儒乐社，是新加坡最老的潮剧及潮乐社团之一。在《陶融儒乐社十六周年纪念特刊》中，马宗彝有一首《送本社陈副社长育三返国》，有句云：“炎荒天气暖烘烘，欢叙正酣兴未穷。忽唱骊歌旋故国，归途敬祝一帆风。”诗作语言浅白、不假雕饰，还原侨民共通的漂泊体验与乡土执念。

总体而言，帆、舟、沧海、明月、归雁、家书等反复出现的诗意意象，构筑起侨海文学的乡愁意境系统。近代华侨以诗词为载体持续书写乡土风物、留存故土记忆、维系族群情感，在长期的抒情实践中完成乡土文化身份的确认与坚守，为离散状态下的海外华侨华人始终保有清



出版于广东中山（香山）的《香山旬报》封面
中山图书馆《近代华侨报刊大系》

晰的文化根脉与族群归属。

诗写家国：从乡土私念到家国认同的精神升维

侨报诗词的情感底色是个体乡愁，其精神高度则体现为家国担当。山河破碎、国运倾颓，身处异域的海外华侨并未置身事外，始终与祖国命运同频共振。侨民诗词的书写由此升维：从个体漂泊、乡土眷恋的私人抒情，逐步转向救亡图存、民族觉醒的公共叙事，完成了从乡土身份认同到中华民族国家认同的深层跃迁。彼时，随着国内民族危机加剧、救亡思潮高涨，侨报诗词的创作主题与价值立场发生转型，作品突破“小我”悲欢的抒情边界，承担起唤醒侨民民族意识、凝聚海外爱国力量、助力民族救亡的时代功能。旅居加拿大的华侨马镜河《寄呈策廷兄七绝》刊载于1940年复版第4卷第4期的《南荫月刊》，有句云：“豪情侠气冲天际，惊动星移发浩歌。”乱世语境下的侨诗，褪去柔婉抒情的气质，呈现出慷慨激昂、刚健质朴的家国风骨。署名汉本的《抗战偶感七绝四首》刊载于《南荫月刊》1940年复版第四卷第四期，作者以“男儿报国气如虹，誓灭倭奴在手中”明志，语言质朴刚健、气势凛然，彰显华夏儿女抵御外侮、誓死卫国的民族气节。这种昂扬的意气、开阖的襟怀，体现海外侨民心系华夏的赤子情怀，也是近代侨民民族意识觉醒的生动文学表征。侨民的家国认同不仅体现于危难之时的挺身而出，也表现为与祖国命运休戚与共的深度共情。当国内抗战取得阶段性胜利，海外侨民同喜同庆、群情振



出版于新加坡的《陶融儒乐社十六周年紀念特刊》封面
中山图书馆《近代华侨报刊大系》

奋。《南荫月刊》1940年复版第三卷第十二期江头韵徒《粤北祝捷》“一声报捷环球震，万众欢腾尽高呼”，表达了与祖国荣辱与共、命运相连的共同体状态。

结语

华侨报刊诗词极少宏大叙事，多属于微观、民间、个体的心灵史书写，它以普通底层侨民的视角记录迁徙之苦、漂泊之思、文化之守与家国之诚。长期身处异质文化圈层的海外侨民，极易遭遇传统文化断层、民族记忆淡化、文化身份模糊的发展困境。侨报刊发的诗词承担着赓续中华文脉、抵御文化失语的重要功能，侨报诗词专栏的持续刊载与广泛传播，使古典格律、传统意象、诗学精神与文化价值在海外侨社群得以代代延续。华侨以诗酬和、以文联谊，在平仄韵律中坚守汉字审美、传承文化传统、巩固民族记忆，在异域他乡构筑起中华文化精神家园。

百年侨史沧桑，侨海诗韵流长。近代海外华侨以诗词为媒介，以报刊为阵地，跨越山海阻隔，在异域完成了乡愁书写、身份建构与家国叙事的三重文化实践。侨报诗词突破传统古典文学的精英范式，扎根底层侨民的生活现实与精神世界，既是一代游子的集体羁旅记忆，也是中华文脉海外传播、民族认同海外建构的重要文本载体。近代华侨报刊诗词的创作与传播实践表明，地域山海可隔，族群根脉永续；时代境遇流变，侨心家国不改。这批跨洋传世的诗章，为考察近代海外华侨华人的文化认同机制、中华文脉的跨国传播路径提供了鲜活的文化样本与重要的历史启示。

【作者系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（网络传播学院、出版学院）教授】